



书海观澜

草根里生出的梦想

——《拯救老街》译后记

方正辉

平和正义。

2023年新年伊始，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英文版。那时，全国在经历了3年艰难的疫情防控后，刚刚开始全面放开。我的直觉是“疫情下的小微企业生存”这个话题会引发读者的普遍共鸣，每个人都会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同身受。

后来，随着阅读和翻译的深入，我沉浸在小企业的兴衰悲欢之中，开始深切地认识到小企业在国计民生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是观察经济社会乃至国家面貌的一个绝佳视角。在小企业逆境求存这面镜子中，照见的不仅是疫情中遭遇了怎样的冲击和挑战，还映射出更广阔的领域。经过6个月的努力，在初步完成译稿后，我仿佛与书中人物融为一体，那些小企业主们已经超越他们自身和所从事的业务，成为大千世界人生性格与命运的缩影，给我以深刻的感染和启迪。因此我想说，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写的是疫情，写的是企业，写的是社会，写的也是人生。

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不仅因为它创造就业和税收，也带来消费和需求；它是社会运转的稳定器，又牵连着千家万户的忧乐；它好像无处不在，所以常常被忽略不计；它又像家常便饭，不引人注目，也不可或缺。不仅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还读到小企业和它的主人们自强不息、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生传奇，感受到小企业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生活方式，仿佛触摸到一个国家和社会创新与活力的细胞和基因，乃至一个人、一群人、广大草根阶层的梦想和希望。由此看来，小企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可以说：小企业兴则国家兴，小企业强则国家强。

作者用手术刀一样精准、犀利、细致的笔锋，对美国政府的弊端痛加揭露和批判，不忌辛辣的嘲讽和尖锐的评论；批判那些只为自己谋利的大企业，以及被利益绑架的政府官员和国会决策者；对小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身处逆境不退缩、咬紧牙关坚持、不断调整变换适应环境，笔下隐含着深切的敬佩和歌颂；对黑人、拉丁裔人及其他弱势群体则是饱含同情，始终在为他们呼吁公

作者采用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手法，使得评论与事实相互交融，剔肤见骨，鞭辟入里。在翻译过程中我经常有这样的感受，这部分内容到这里似乎已经曲终人散，应该转换到其他话题上。却不料，循着这一话题继续深入，奇峰突现，别开生面。这种高超的叙事技巧，加上作者在现实问题剖析中表现出的诚实和勇气以及分明的爱与恨，形成一种语言张力，读来欲罢不能。

作者特别注重观察和揭示人物的命运，不是平面地记录人物事件，也不是单一的线索叙述，而是从历史、家庭、环境、性格、亲友等诸方面挖掘，纵横交错，使得一个普通人、一家寻常小店、一个经营细节，往往具有思想的深度和感人的温度，弥漫着淡淡的历史沧桑感，人物和企业形象栩栩如生，令人常常为之怦然心动。

作者在书中着墨最多、几乎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就是库苏马诺和他的餐馆。从他的祖父、父母到自己的家庭，从他幼年在餐饮方面表现出的天赋到上大学时开始进入餐饮业，他的性格、爱好、家人、朋友，他拿手的菜肴是怎么做出来的、遇到挑剔的顾客怎么应对、身处逆境如何权衡进退，都娓娓道来，逐一呈现，从创业、低谷、挫折，到不屈、开拓、坚持，汇聚起一个小企业家的众多特质，可谓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不认输、顽强坚韧、顺势应势、不断变化，凝聚成一种鲜明的小企业精神。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备受推崇的企业家精神，甚至可以称之为民族精神的缩影。

因此，本书也可以说是了解和感知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今日美国的万花筒和众生相。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际关系、风俗人情，都细致可感。有时会心一笑，有时扼腕叹息，有时由衷感慨，有时深长思之。我们常说讲好故事需要知己知彼，这本书就是有益的借鉴。在这里，决策者可以资政，经营者可以取经。年长者洞察历史，感悟今昔；年轻人感受励志，开启梦想。正所谓居庙堂之高，可以察民疾苦；处江湖之远，可以评施政得失。

3年疫情，每个人都身处其中。这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事实上，我也不相信经历过的人容易忘记这百年不遇的事变。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像本书一样记载这段历史的专著。从这个角度看，它可能远远超越了小企业这个话题。2023年5月，当本书已经翻译大半时，一波“二阳”潮袭来，周围很多朋友再次感染，也包括在上一轮从未感染过的。本来，已经完全恢复常态的生活让人们正在淡忘疫情，而这一波又给人们提了个醒，虽说症状普遍比上一波轻，但病毒尚未远去，阴影依然徘徊。因此，书中的故事和情形，就不仅仅有纪念意义了。

疫情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的黑天鹅，百年不遇，或许从此不见。但是对小企业来说，那些与生俱来的弱点、先天的不足，以及经营中无处不在的困难和逆境，可以说是永不消失的疫情，将永远伴随小企业存在。面对现实，那些成功的小企业主往往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不论是出于生存、传承还是兴趣，开办一家小企业都必须有强烈的热爱之情。小企业通常进入门槛低，这就意味着竞争激烈，淘汰率高。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热爱不会轻言放弃。这个门槛就不是可以轻易迈过的了。

二是超乎寻常的执著。这就是传统的商业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体现，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孜孜以求产品和服务的极致，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从不懈怠。事实上，这也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过程中持续锻造自己的核心能力和差异化优势，任何挫折、困难、失意都不能动摇他们的坚守。

三是永不停息的变化。不但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应变、应变，而且不断分析消费者需求，主动求变、善变，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热爱不是抱残守缺，执著更不是故步自封。就像足球比赛必须在运动中寻找射门机会，小企业更要善于在变化中寻找新的机遇，这就是创新和调适，也是绝地重生的不二法门。

在疫情肆虐中，一批小企业倒下，永远消失了，还有一些九死一生活下来了，特别是有一些经过疫情劫难反而更加强大起来。深入观察，他们的精神内核都是相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所描述的现象、揭示的道理、引发的思考，就不仅局限于疫情这一非常时期，而是面对困难和挑战、小企业如何应对、政府如何决策的一个永恒主题。

当然，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最动人的地方，是小企业主与生俱来的禀赋和特质。就像书中作者所说：“有的人靠创新求生，有的人凭坚守持续，但所有的幸存者都是依靠自己的精神和力量渡过难关。”

小企业在疫情中最终没有像专家学者预测的那样大量倒闭，正是因为小企业主这种流淌在血液中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这是任何工具都难以精确评估的最大变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如果我们在谈论经济增长时忽略了企业家的存在，就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而关注企业家精神，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正是本书观察小企业最具特色的地方。

草根怀有的梦想，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弥足珍贵的发展力量。我想，如果我们还做不到为这样的梦想插上翅膀，不知道如何去支持、帮助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至少可以让这种在草根里生长出来的梦想安静自由地在广袤的大地上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哪怕枯萎和凋谢，也会化作春风又生的养料。也许，这就是小企业需要的生存气候和土壤。

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不仅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失误和差错，还因为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那种推敲、体会、感悟、斟酌真的永无穷尽。每一次定稿后都会发现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每个曾经满意的表达后来都有更好的可以取代。这就是“译”无止境吧！

（作者系《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高级编辑，籍贯河南省新乡市）



有感而发

侯万尊与邓克保

刘吉同（新乡市）

题目中的两人都与柏杨有关。侯万尊是柏杨1933年在辉县县立小学上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他聪明能干但性情暴躁，对算术不好的学生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每错一道题便打5手板。柏杨的数学不好，因此“每天的算术课，我总是挨揍10或20手板。侯万尊不是只打我一个孩子，他打所有算术不好的孩子，一名叫秦鼎的孩子，也经常被打得哭哭啼啼”。一次，大伙在校园打篮球，侯万尊也来了，并且连着投进两个球，柏杨捡起球传给他，故意讨好地喊了一声：“侯老师，再投一个！”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不对，侯万尊突然脸色大变，喝问：“你怎么敢对老师持这种态度？跟我来！”于是柏杨跟着来到他的宿舍。此刻，侯万尊抽出手板，狞笑着说：“伸出手来，我不打你右手，好让你写字，我打你左手。”说罢手板雨点般地打在柏杨伸出来的左手上，一直把小手打得渗出鲜血，痛得柏杨哇哇大叫。“这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重大侮辱，我把侯万尊恨入骨髓，心想长大了一定要报复。”（春风文艺出版社，周碧蕊《柏杨回忆录》24页）

邓克保是班里的一名女生，体态娇小。然而，由于邓克保天生善良，或许柏杨对她还有点“单相思”，故柏杨不但把她的名字记了一辈子，而且还让她“名扬海内外”。1961年，柏杨在台北《自立晚报》连载小说《异域》，其笔名和书中的男主角，都叫邓克保。《异域》在当年只有1800万人口的台湾，狂销100余万册，而电影《异域》1990年上映时，在亚洲也创造了票房纪录（广西师大出版社，郭本城《我的父亲柏杨：背影》29页），可见邓克保的名字，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

这两个人的“遭遇”告诉人们什么呢？人要善良，不要作恶，因为“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对于邓克保和侯万尊来说，此时的神明就是柏杨手中那支不朽的笔。当然，文艺



往事如歌

书摊奇遇结良缘

杜翔（山东省临沂市）

年少时，东方红电影院对面的马路边有一处租书摊。

每到周末，租书摊上就围满了密密麻麻的孩子。好不容易挤到书摊前，一本本排列整齐的小画书映入眼帘。我一眼就看到了一本崭新的《东海女民兵》画册。巴掌大薄薄的小册子，线条的彩色封面，插图用简单黑色的线条勾勒出故事中的人物和场景。女民兵英姿飒爽的形象跃然纸上，画册下方空白处印着几行文字，将画面内容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补充说明。画册上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爱不释手，索性站在原地开始了阅读。

租书摊主是一个帅气的男孩，看到我认真翻阅时那双发亮的眼睛，不失时机地兜售生意：“租画书看吗？租一本5分钱。男孩热情地招呼我。

我不顾手痒，看到为数不多的小板凳上坐满了孩子，更多的孩子席地而坐。我把口袋里揣了多日的5分钱掏出来付了租金，手捧画书一口气读完了。

后来，我常去租书摊上看小画书，渐渐和租书的摊主熟悉了。开始5分钱看一本，后来可以多看一本，再后来随意看。人多的时候，租书摊主还特意把他屁股下的板凳让我坐。

随着年龄增长，小画书带给我的新鲜感渐渐消退了。中学时期，同学之间掀起了琼瑶热和三毛热。因为囊中羞涩，买书又是那个时代最奢侈的花销，而我不过是一个无力购买而又渴望读到书的学生。于是我发明了“窃读”法。所谓“窃读”法，就是买了书为借口请借书阿姨把书拿给我看，看过之后再以此书不好看为由还给借书阿姨。说白了，就是白看书而不用花钱买书的读书法。周末或寒暑假期间，我有充足的理由在书店里待上一整天。

有一天，我正兴致勃勃地读到一本书的精彩之处，书店该关门了。书中的故事已使我全神贯注，舍不得放下了，只能极不情愿地还书，恋恋不舍地离去。我回到家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满脑子牵挂着书中主人公的命运。第二天一放学我就急忙跑进书店，向借书阿姨讨回那本书，趴在柜台上，直读到天昏地暗才肯离去。

站着读书久了，双腿酸疼麻木，我就会交替着用一条腿支撑另一条腿。有时忘形地撇着屁股趴在柜台上，以求暂时的休息，全然不顾一个女孩的矜持形象。每次从书店出来，我都像

作品中的邓克保与当时辉县一小的邓克保，已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了。但是，邓克保这个名字却长久地留在了人间。这正是邓克保的善良得到的回报，因为她的善良征服了她的同学郭定生即后来的大作家柏杨。据说邓克保小学毕业后就逝去了。没活几年的小姑娘，生前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她日后的“成名”。当然，书中也写下了对柏杨一生有深远影响、态度自然、和气的恩师——县立小学的犹太裔老师克非和柏杨十分怀念的百泉初中的校长梁锡山。1988年，柏杨回故乡时还念叨着他们。但侯万尊却是个反面人物，他以老师之强，肆意欺凌一个弱小的学生。因为他的恶行令柏杨终生难忘，于是也把他写进了回忆录，侯万尊不想“青史留名”都不行。道理很简单，柏杨的书是要传世的。这一点，生前的侯万尊恐怕同样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再说说善。不能为善而善，不能视情而善、因人而善，而应听从灵魂的驱使，始终如一，使善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再说侯万尊，他的可恶，固然与其性格有关，但更大的原因窃以为来自他的“无所畏惧”，心中没有一个“怕”字，不怕良心受谴责，不怕被法纪惩罚，不怕被家长报复，更不怕上天报应。因此，他有所欲为，肆无忌惮，面对孩子，出手就是打。进而再想，“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是很可怕的。因此，人生在世应有一个“怕”字，怕父母，怕舆论，怕正义，怕法律。这样才不会失去底线，才不会出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那样的无限后悔和不可挽回。

其实，即便从功利的角度，做人也要善良而不能作恶，因为你不知道天空中哪块云彩会下雨。正像侯万尊不知道当年被他痛打的郭定生这块“云彩”会下雨一样，70年后直接把他恶名写入了历史。这惩罚够厉害了吧。



岁月华章

听伯父范东华讲革命史

范建社 王聚臣（封丘县）

在一个难忘的时刻，我听到伯父讲述他自己的革命经历。震撼和敬佩之余，我决定把听到的一切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我响应号召去豫南农村当知青。1974年7月5日早上，我突然收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满怀悲痛回郑州奔丧。此时，伯父范东华闻讯也来郑州吊唁。于是，就有了我们三人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唯一一次聚会。也是这次相聚，才让我有机会聆听到老一辈革命者范东华伯父的讲述，才知道了封丘县冯村乡小里薛村我的前辈子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英勇事迹。

当天夜深人静以后，伯父和父亲兄弟俩开始了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我是在听）。话题是从父亲问大伯谁是他入党介绍人开始的。大伯听后不加假思索说：“是我娘。”父亲惊奇地说：“是她？”紧接着，大伯的话匣子打开，一发而不可收。

说到小里薛村范家怎么会成为情报站时，范东华（我们称佛大伯）讲，这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他的长兄范汝钦（我们称钟大伯）就是一个革命的火种。早年范汝钦到南方投身革命，后来因战斗中负伤，组织上派他回家乡养伤，实际上是边养伤边做地下工作。范汝钦和长垣县（今长垣市）杏园村的张经、张荡斋叔侄是亲戚，喊张经为表叔，喊张荡斋为表哥。而他们是长封一带共产党的领导人。原先范汝钦的组织关系是由上级敌工部直接管理的，所以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并不知情，直到上级党组织向他们秘密通报时，双方才接上关系。这样，范汝钦和他们叔侄既是亲戚又是革命同志。之后就有了范汝钦是中共小里薛村党小组第一任组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这些事情。

其次，要说到小里薛村情报站情报员马淑芳。她是留光镇谢庄村人，嫁过来以后，是真正的贤妻良母，骨子里满是机智干练。那个时候，杏园村地下党组织派张荡斋到小里薛村、大李庄村一带开展革命活动。马淑芳听后十分向往革命，拥护共产党，张荡斋就把她培养、发展成地下党员。中共长封区委情报站设立在马淑芳家以后，她又成了封丘县第一个地下女交通员。

再次，设立情报站不但要有可靠的政治基础，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小里薛村情报站的主要任务，那就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我们范氏宗亲老四门，那个时候虽不富足，但生活上还算过得去。我们老四门居住地相对集中，虽然都是自立门户，但院院相连、户户相通，这种居住形态既方便隐蔽又容易逃走。最重要的是，老四门的人基本上是进步群众、堡垒户，政治上可靠，地理位置优越，关键时刻能做到藏得住、送得出、打得好。当时，中共长封区委领导张经、张荡斋、段美敏、刘杰等，都曾在小里薛村情报站小住和避敌，从未发生过意外。中共长封区委领导对小里薛村情报站的评价是：政治上靠得住，人脉上有资源，经济上能自立。因此，情报站设在小里薛村范家最为合适。

当伯父说到范家众兄弟时，声音有点哽咽：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坚持在范氏宗亲老四门兄弟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中共党员。只是因为特殊斗争的需要，也是为了不让敌人拿到把柄，原则上是单线联系、个别发展，都不办理书面入党手续，那是隐蔽战线斗争的需要。小里薛村范氏宗亲老四门的老少爷们为中共长封区委、小里薛村情报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兄弟们只要是听到有任务，都踊跃报名，个个争先，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伯父在敌工部的指示下，派兄弟们深入敌人营中当兵，摸敌情，做兵运，拉队伍。记得是1942年7月，组织上要了解本地国民党日伪军内部的布防情况，伯父派范汝钦成混入驻扎在封丘县大张庄村的国民党游击总队第70支队搜集敌情；1943年2月，又安排范汝成到长垣县南关参加国民党保安队（还乡团），都是为了瓦解敌人、争取士兵转变做工作。在敌军心脏里面工作是很危险的，每时每刻都面临被捕或者牺牲。但这也让许多人们得到了锻炼，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伯父感叹说，搞情报工作时刻充满危险。1944年8月，小里薛村情报站党支部书记兼情报员王振生，在大李庄村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后被汉奸刘凤桐抓捕，当时的罪名是“通八路”。王彦忠得到消息后立即到小里薛

村向党支部书记范汝钦报告。范汝钦感到事态严重，急忙向杏园村的中共长封区委汇报。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曾去王振生有接触的党员范汝钦、范汝宗、张荡斋、胡广心4人去卫南县暂时躲避，并对留下的党员进行了妥善安置。这一次，位于杏园村的中共长封区委和小里薛村党支部也横遭敌军洗劫。凶恶的敌军一次又一次派兵抄了马淑芳、范汝钦、范汝成、范汝梅和范汝鸣等人的家，又派便衣特工潜伏在马淑芳家中，妄图摧毁情报站，密捕我方情报人员。幸好党支部有准备，才使敌军的阴谋没有得逞。

说起马淑芳，伯父充满了愧疚和敬佩。他说，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多年，其他困难都能克服和承受，可对人对亲人的折磨让他无法忘记，特别是马淑芳，她老人家受的苦太多了。1946年6月，封丘县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不少人饿死在逃荒的路上。马淑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领一家老小艰难度日，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了党。入党以后，她始终如一地把党交给的工作挂在心上，想方设法去完成。那时中共曲河县委在封丘县东边，出于对敌斗争需要，中共曲河县委主要领导白天在马村办公，夜里回到小里薛村马淑芳家居住。时间一长，难免被敌人发现，他们不断对马淑芳家突袭和搜查。1948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马淑芳夫妻带着他的两个小孙子在外面避难。孙儿们想回家，马淑芳又考虑是过节，就决定回家一次。到家后，马淑芳从邻居家借来油、准备炸丸子。开始烧锅的时候，忽然听到本家范嘉霖在院墙上喊范汝钦（范汝钦的小名），快跑吧，敌人又来了呀！”听到呼喊，我父亲范恩昶伸手拽住没有顾上穿鞋的小孙子就往外跑。在逃跑的路上，范汝钦的脚被扎破，鲜血直流，范恩昶说：“跑慢了就没有命了！”他们爷儿仨一直跑到榆林南的小庵里藏了一夜。马淑芳没能跑得了，被敌人抓住了。穷凶极恶的匪军把她打得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可她自始至终就是三个字“不知道”。敌人用枪对着马淑芳的头说：“你儿子在哪里？枪在哪里？不说现在就打死你。”马淑芳镇定自若地说道：“不知道就是不知

道，在这个家我是后娘，儿子和我都不搭理，他有没有事我怎么知道？你们要是不信，可以问问俺村的保长。”随同敌人前来搜查的本村保长姚书文回答说：“马淑芳的确是后娘，在家里不受待见，他们一家像防贼一样防着她，马淑芳她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打也打了，搜也搜了，吓也吓了，无计可施的敌人又一次把家里掀了个底朝天，气急败坏地撤走了。家里面不能待了，马淑芳夫妻只能带着她的两个小孙子去黄河滩里避难。

听范汝钦讲，马淑芳曾经不顾生命危险混入开封城里，在大南门路西有一家布店，她带着小孙子范鹤鸣作掩护，多次去那里交换情报。为了保密和不给人添麻烦，马淑芳工作从未告诉任何人。情报紧急时，马淑芳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在开封城里摸到的敌军情报迅速传递到情报站。解放开封时，战斗即将打响，黄河两岸的渡船都被国民党军队控制，一般人根本无法过河。母亲带着范鹤鸣长途跋涉，步行90里赶到贯台渡口，终于搭上了夜里的渡船，第二天太阳还没有露头就把情报送到指定的站点。

伯父和父亲兄弟两人的交谈，让我听得入了迷。通过聆听伯父范东华的讲述，我才对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有所了解，才知道介绍他入党的领路人也是祖母马淑芳，才知道小里薛村的范氏宗亲、老少爷们，为情报站、为中共长封区委作了许多贡献，诞生了许多无名英雄。我为革命前辈们的壮举感到骄傲和自豪！这里，我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写出来，让他们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他们是：马淑芳、范东华、范汝钦、范汝弼、范汝成、范汝梅、范汝宗、范汝贤、范嘉霖等。

最后，特别感谢范鹤鸣、范建勋、范巍等人对本文的支持。

